

# 虚伪是文化人的一大病

倘中国没有“大散文”，可惜而已。倘中国没有真诚的知识分子，便很可悲。

“含泪劝说”一波未平，“秋雨旧居”“秋雨大师”一波又起。余秋雨先生的名人效应的确未可估量。对余秋雨先生种种事迹反对者不多，嘲笑者不少。

不好意思，我恰恰是嘲笑者之一。我觉得，搞笑之处并不在于余先生是否够格称大师，其旧居是否够格成故居，而在于余秋雨先生扭扭捏捏的做派，半推半就的姿态。活脱脱欲扬先抑，欲擒故纵，欲骄傲还娇羞，欲谦虚还骄蛮。

中国人最讨厌知识分子的不是自大，不是谦虚，而是虚伪，虚骄，虚蛮，虚假。

中国人并不一味地讨厌自大。台

湾有个李敖，曾经自诩：五百年来自白话文的，第一是李敖，第二是李敖，第三还是李敖。他形容自己生平有两大遗憾：一无法找到像李敖这样精彩的人做朋友；二无法坐在台下去听李敖的精彩演说。南朝有个谢灵运，夸下海口：魏晋以来，天下文学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人共分一斗。李敖和谢灵运，可谓狂妄，但有人骂他们狂狷，没人骂他们虚伪。

中国人亦不讨厌谦虚。季羨林先生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现在“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说如果头上有一顶国学大师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说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启功先生则在《自撰墓志铭》中说：“中

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季羨林和启功，可谓至谦矣，但是顶多人骂他俩挡住了他们的“大师梦”，但无人骂他们虚伪。

谦虚是中国知识分子公认的美德。余秋雨先生在《霜冷长河》里也说：“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那么，余先生为何又扭扭捏捏地接受大师称号呢？把“大师”降格到“老师”以下，顺坡下驴坦然接受，就有些侮辱公众的智商了，而在“被迫”接受之后还欣欣然在“个人官方中文网”上“热烈祝贺”，就更有些惺惺作态了。

骄傲未必非大师，谦虚如何不泰斗。无论是谦虚还是骄傲，只要来得真诚，来得率真，不傲慢无礼，不故作谦虚，世人自会尊重，同行自会理解。但是，谁也甭想把两头都占了，既得了骄

傲的便宜，又占了谦虚的美名。天底下没有这样的美事。

鲁迅先生在讽刺学衡派时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我所佩服余秋雨先生的也只有这一点，这样沾名钓誉的虚伪游戏你也敢玩，真是把全国知识分子都雷倒了。左拉说真诚是通向荣誉之路，我看虚伪是通向跌落之途。

狂狷无胆，谦逊无量，忏悔无门。这是我对余秋雨先生的评价。虚伪，不真诚，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怕的病灶之一。倘中国没有“大散文”，可惜而已。倘中国没有真诚的知识分子，便很可悲。

我就不信，余先生，咱们真诚一点还能出人命吗？

(来源:新京报 孟波)

## 大智若驴

《大智若驴》(TheWisdomofDonkeys)这本书有一个非同凡响的标题：在纷乱的世界寻找宁静

(FindingTranquilityinaChaoticWorld)。本书作者AndyMerifield生于英国利物浦，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教地理。他现在住在法国乡下，写书，包括哲学家传记。怪不得我看这本书，就仿佛是在看哲学普及本。他从毛驴身上，说海德格尔的calculatedthinking和meditative thinking，斯宾诺莎的永恒，圣经中驴和巴兰先知的对话，以及唐代诗人在毛驴上的道别。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是骑着毛驴走遍书山。这个作者挺博学，真是让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里头《唐吉珂德》《金银岛》《白痴》，一部部经典信手拈来啊。这本书写得像散步，慢悠悠地，好像没有什么目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这也是它耐读的一个地方。

当然书根本还是说毛驴。作者自

己有头毛驴，叫Gribouille，他经常会牵着毛驴跑，和毛驴“对话”，或是享受各自的宁静。你可以对马嘶指气使，但是对毛驴只能耐心探问(Youcantellahorse.Youcanonlyaskadonkey)。毛驴在磨练他的耐性，也在磨练他在宁静的修行。这个修行未必是要到达某个目的，因为宁静本身就是作者要去追求的境界。现代的社会万马奔腾，一个以驴为友的人，才能做到边走边看，用作者的话来说：Watchtheworldgoby——看着世界在身边溜走。

作者也曾经在纽约打拼过，当过“美漂”。他曾经希望自己在TheNation上写下封面文章后，从此可以功成名就，成为纽约上层人物：WestEnd大道，我来了！就是这种功名心，如同火

一样在心里燃烧。突一日，他猛然清醒过来，叫道：多么愚蠢啊！总想做一个不是自己的人，总是在玩别人的游戏。纽约在吞吃我的大脑！这不是一个保持自我的地方。你的眼睛晃荡着太多成功。这种游戏想不去玩都不行。那里也没有什么毛驴，只有拖着马车的疲惫的老马。我就如同先知巴兰，急吼吼往前冲。我就如同《唐吉珂德》里的桑丘，一心要当小岛的总督！

他离开了这种生活，来到一人一驴的宁静乡下。有时候他在乡村，爬上山，那时的宁静如音乐一般，他看着自然之礼堂一般的草地，舒伯特的音乐在他脑海里响起。他看着草地上吃草的毛驴，在这样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他觉得是一种心灵的疗治，一种冥想。

在这里浑然忘我，却又能发现自我。你可以一直看，看得如催眠一般，看得似乎上瘾。

我昨夜在院子里看这本书。这是一个热天，好在风很大，吹过竹林和松树，若不是开灯看书，头顶就是满天星光，在那一刻，作者说他在山顶看驴吃草感到的那种宁静，也越过遥远的空间，弥漫到我的身边。澳大利亚有句俗语说，你坐着看毛驴吃草的时候，你都能忘掉屁股下还有个凳子。我在看这本驴之书，看着看着，忘记了凳子上还有个屁股。

世上竟有此闲人，看毛驴看上瘾来。我想日后的“驴友”，与其背着包汗流浹背地做背包族，不如租头毛驴慢悠悠地前行。人在旅途未必全是赶路，从一个目标到另外一个目标。人活着有很多事情可做，这么慢慢走也是一种。这一点毛驴都会，我们不会学不会吧？(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桥)

近日深圳梧桐山9亿元修建老子文化园的消息一经披露，即引起社会广泛争议和质疑，对此有关方面作了许多辩解，称梧桐山是道家36洞天之一，建老子文化园依据充足；又称“扰民”“敛财”等质疑均属多虑，建这文化园只为弘扬老子思想，云云。

据查，道家所谓“10洞天”“36洞天”“72福地”等说法有好几种，但提及在广东境内的只有连山、罗浮山和清远山，并无梧桐山，即使某种说法中有“福地”“洞天”诸说，也是汉末、南北朝方才兴起的天师派道教的思想体系，算不到春秋时代的老子头上，所谓“老子文化”，所谓“弘扬老子思想”，所谓“确凿的历史依据”，不知从何说起。如果沾边就算，那么《西游记》里沿途仙山无数，难道“老子文化园”就可依此在唐玄奘经过的新疆、中亚、印度一路走下去？要知道玄奘可是千真万确在印度巴特那的那烂陀寺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照梧桐山的逻辑，巴特那建“老

## 老子还认得回家的路吗？

子文化园”的历史依据岂不是更充分得多？

老子崇尚虚、无，主张清静无为，反对大事铺张，因此春秋典籍中关于他本人的资料非常少，以至于他究竟姓李还是姓老，李耳和老聃是否同一个人，长期以来都莫衷一是。照他的哲学思想逻辑，对于道家到处修建不算铺张的老君庙，恐怕都是无可奈何且不以以为然的，梧桐山的老子文化园耗资九亿，岂不是让他瞠目结舌？老子说过“治人事天，莫如啬”“夫唯啬，是谓早复。早复谓之重积德”，主张勤俭节约，道法自然，如今有关方面不但要耗巨资，兴土木，而且还要在号称“深圳心肺”的青山上动土，老子泉下有知，怕是要吹胡子瞪眼睛，狠狠批驳一番，这样一个大违老子思想原则的项目，居然堂皇名之曰“老子文化园”，真是莫大的讽刺了。

尽管有关方面反复强调“不为敛财”，但9亿元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是取之于民，自然很不应该；倘如按有关方面所解释的取之于商，那么在商言商，于情于理，他们都不可能不求回报，即使不在门票等方面索求，也会在其他方面找补，而又有谁敢拍胸脯保证，他们所找补的，不是社会资源，不是公共财富？

说起来这也不是老子头一遭碰上这种“拉郎配”的事儿了，早在多年前，河南鹿邑和安徽涡阳就为争夺“老子故里”比赛一般大兴土木，鹿邑的排场笔者未见识到，和它打擂台的老涡阳，一个皖北贫困县，不惜工本，先后两期建成了占地259亩的全新天静宫，不但新“古迹”尘埃不染，甚至真正古迹“老庙”和据说是地道汉代古井的九龙井也整旧如新，竖起了高达5.5米重6000公斤，据说是全国最大

的老子铜像，还要大兴土木，重修据说是老子出生地的“流星园”，甚至照传说应该远在函谷关、和涡阳八竿子打不着的关尹喜，也被“考据”出一座墓，郑重其事地予以纪念。说到底，花这么多钱，用这么多心思，争的还是政绩和利益，可结果又怎样？巨资兴建的天静宫游人寥寥，笔者去时，新修的山门附近居然还晒着农家的稻谷。涡阳的天静宫好歹是古迹翻新，“老子故里”也有迹可循，梧桐山平地拔起的“老子文化园”，又凭什么可以独享好命？

如果照梧桐山的范例，36洞天、72福地，以及那些挨得上挨不上的地方都搞这么一个老子纪念园，老子别说“化三清”，就是化三千清，又如何认得回家的路？

真的纪念老子思想应该如何做？老子自己在《道德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对照一下，就该明白哪些事不该做，哪些钱不该花了。(来源:新京报 陶短房)

##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如果有人想用很小的空间，譬如一间屋子，来最大限度地容纳悠久浩瀚的人类精神的历史，那他大概可以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为这间屋子精心挑选书籍。

不过，把书放在自己的屋子里，却并不等于拥有了这些书。拥有一本书的真正意思是：阅读它，通过阅读使书的内涵进入自己的精神和心灵。

所以，如果一个人想用很小的空间，来最大限度地容纳悠久浩瀚的人类精神的历史，他有一个比屋子更好的放书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精神和心灵空间。

而一个人的心灵有多大呢？在有的人那里，它很小，小得只能装下一点点东西，我们会感觉到这样的心灵很贫乏，当贫乏到什么也装不下的程度时，我们会说这样的人是没有心灵的；比起来，我们当然更愿意看到那些巨大而丰富的心灵，在这样的心灵里面，

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人类精神的悠久浩瀚。

德国伟大的作家歌德(Johann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曾经在书信里说：“我要像《古兰经》里的摩西那样祈祷：主啊，给我狭窄的胸以空间。”冯至(1905—1993)在著名的《十四行集》里，把这句话改成了两行诗：“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谁不追求精神和心灵空间的扩展呢？可是，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扩展？怎样才能使个人的狭窄的心逐渐变大，变得丰富多彩，变成一个大的心灵宇宙？

读书是特别重要的一条途径。

出生在德国，后来加入瑞士籍的小说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非常生动地描述过读书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扩大着人的心灵空间的动人情景：

每一年，我们都看见成千上万的

儿童走进学校，开始学写字母，拼音音节。我们总发现多数儿童很快就巴把会阅读当成自然而无足轻重的事，只有少数儿童才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地对学校给予自己的这把金钥匙感到惊讶和痴迷，并不断加以使用。他们为新学会的字母而骄傲，继而又克服困难，读懂一句诗或一句格言，又读懂第一则故事，第一篇童话。当多数人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快就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商业版时，少数人仍然为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所风靡。这少数人将成为读书家。他们儿时便在课本里发现了诗和故事。但在学会阅读技巧之后并不背弃它们，而是继续深入书的世界，一步一步地去发现这个世界是何等广大恢宏，何等气象万千和令人幸福神往！最初，他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一所小小的美丽幼儿园，园内有种着郁金香的花坛，有金鱼池；后来，幼儿园变成了城里的大公园，变成了城市和国家。变成了一个

洲乃至全世界，变成了天上的乐园和地上的象牙海岸，永远以新的魅力吸引着他们，永远放射着异彩。昨天的花园、公园或原始森林，今天或明天将变为一座庙堂，一座有着无数的殿宇和院落的庙堂；一切民族和时代的精神都聚集其中，都等待着新的召唤和复苏，都时刻准备着那笼罩着万千种声音和形式的同一性体验。对于每一位真正的读者来说，这无尽的书世界都会是不同的样子，每一个人还将在其中寻觅并且体验到他自己。这个人从童话和印第安人故事出发，继续摸索着走向莎士比亚和但丁；那个人从课本里第一篇描写星空的短文开始，走向开普勒或者爱因斯坦……通过原始密林的路有成千上万条，要达到的目的也有成千上万个，可没有一个是最后的终点，在眼前的终点后面，又将展现出一片片新的广阔的原野……

(来源:《新华文摘》张新颖)

### 孔子原来这么说

沈善增的新著《孔子原来这么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选取了《论语》中为国人耳熟能详,而又被作者认为遭受两千多年严重误读的十一段章句进行了详细甄读。下面是其中几例。

原文: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旧注:孔子说:“女子和小人可算是难以养护了,亲近了就放肆,疏远了就抱怨。”(《论语译注》)

沈善增新注:孔子说:“只有妻妾、儿子、只求功利的侍臣,这些君主周围关系亲密的人,是最难教养的。用接近然后规范他们的办法去教养,他们会不听话;用保持距离然后规范他们的办法去教养,他们会怨恨。”

原文: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旧注:孔子说:“质朴胜于文采就陋略,文采胜于质朴就雕琢。文采、质朴兼备,才是君子。”(《论语译注》)

沈善增新注:孔子说:“要使有价值的内容具有优美的形式,就要效法民间的礼乐;要使优美的形式能表达有价值的内容,就要效法史书记载的礼乐。优美的形式和有价值的内容相得益彰,然后成为君子的礼乐。”

原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旧注: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注释可能是东汉经学家郑玄的注,他说:“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

沈善增新注:孔子说:“如果民众的力量可以使用,就随顺他们;如果民众的力量不能够使用,就要去了解他们。”

(来源:文摘报)

### 经典“四书”成清华必修

今年,“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将成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实验班本科生的必修课中的内容。开课教授彭林表示,“这种尝试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本民族文化经典,背诵‘四书’有可能作为考试的内容之一。”

彭林称,“现在不少毕业的博士,都没有读过‘四书’,而解放前,有人能够背诵‘十三经’,学史史哲的学生不好过‘四书’都没有读过是很不好的。”

彭林说,“四书”是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实验班本科生的必修课,每周有四个课时,讲课时间为一小时,学生课时合格后一般能获得4个学分。“我要求学生逐字逐句阅读,并能把《四书》全部背诵。经过这样较为系统的学习,同学们就会大体具备阅读古籍的能力。虽然以前我们都说朱熹的注解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但是,朱熹的注解流传了六百年,他吸收了前人的优点。因此,我将以朱熹的注释为主进行讲解,同时也会告诉学生汉唐人怎么理解。我们主要是了解经典本身,而不会像南怀瑾、于丹那样来讲。”

清华大学历史系一在读研究生表示,“让本科生来背诵‘四书’有点晚了,全部背诵下来应该在中学完成,现在让学生全部背下来不太可能。当然,鼓励学生读经典,想法还是挺好的。如果有时间,我也想去听听。”

《大学人文读本》编者之一某大学教授表示,自己不反对让学生读经,但是,是否要把“四书”全部背下来,要看学生是否有精力投入,在网络时代,知识的传播和教育也要与时俱进。他还认为,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儒家经典在过去主要靠私塾、书院、科举制度结合起来进行传播。1905年以后,科举制度取消了,经典的传播方式就变了,“如果高考、公务员考试要考‘四书五经’,那么能够背诵的人肯定很多。”

(来源:新京报 张弘)